

中国新闻出版业

欣欣向荣 气象万千

本报记者 张 贺

经典中国·辉煌30年

“没有30年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出版业今天这样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正是改革开放解放了出版生产力。”30年来,中国新闻出版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完成了由政府办新闻、办出版到政府管新闻、管出版的转变,实现了出版机构从事业到企业的转变,出版业的积极性空前释放,竞争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一个繁荣而活跃的出版市场已经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出版大国。

从贫乏到丰富,改革造就出版大国

对读者而言,30年来,一个最鲜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种类空前丰富。现在走进任何一家新华书店,琳琅满目的图书报刊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即便在偏远地区的农家书屋里,也不难发现许多最新出版的书籍。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改革开放之初,读者为求一书而不得的痛苦。”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任吉生回忆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图书种类甚少,一本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往往引起轰

动。柳斌杰在与人民网网友对话时也曾回忆,30年前,要想找一本外语书、要想找一部辞典都非常困难,书的品种极少,生产单位也很少,全国只有100余家出版社。

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的出版社从105家发展到573家,增加4.5倍;报纸从186种,增加到1938种,增加9.6倍;期刊从930种,增加到9468种,增加9.2倍;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从1.5万种发展到23万种,成为世界上图书品种最多的国家。

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启发展新路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90年代初,我国出版社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使得出版社的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淡薄。许多出版社面临着体制僵化、人浮于事、包袱沉重、效益停滞的困境,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由于出版业的复杂性,这一时期的出版改革只是在出版范围、出版方式、发行等领域作了调整和改良,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体制、机制并未被触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这一年开始,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发行零售领域、大型出版发行集团开始在各地组建。2002年,党的十六大做出加快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出版业的改革发展进入快车道。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在所确定的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就有21家。试点出版单位从体制创新入手,为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宝贵经验。

辽宁出版集团是全国首批改革试点单位,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产业集团公司,对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辽宁出版集团实施了出版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结构调整,2004年实现了所有员工全部聘任上岗。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辽宁出版集团将原来所属20余家主管主办单位全部变成以资本为纽带的全资子公司,将生产要素合理集中,将经营不善出版社的出版资源向其他高产出版单位流动,对经营状态欠佳的两家期刊和一家出版社进行了关、停,实施了重组和内外公开招投标经营。改革使得辽宁出版集团焕发出空前的活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大幅提高。

目前全国24家出版集团中,有17家完成转企改制,平均总资产增长66.2%,利润总额增长25.3%。跨区域经营、连锁经营等新的业态纷纷出现,一个全国统一的出版物大市场初现端倪。

从封闭到开放,改革坚守正确方向

改革之初曾有人担心,转企改制会不会弱

化党对新闻出版的领导,会不会使新闻出版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在2008年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面前,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优秀表现有力地回答了这个疑问。无论是南方冰雪灾害,还是汶川大地震,无论是奥运火炬传递,还是两个奥运召开期间,我国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不畏艰险、挺立潮头,用最快的速度推出报道和书刊,用准确真实、生动鲜活的报道传递人民的呼声,传达党的政策,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向全世界树立了改革开放后崭新的中国形象。

实力日益壮大的中国新闻出版业已经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司司长谢爱伟曾多次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她回忆说,最初参展的时候,由于不懂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所带去的图书难以适销对路,图书种类少不说,就连展台布置也显得很简陋。而最近几年,参展的中国图书种类丰富、包装精美,展台布置别具匠心,许多国外的版权代理公司和出版社对中国图书越来越感兴趣。为进一步落实“走出去战略”,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为国外出版社签订购买中国图书版权提供翻译资助。目前推广计划已与27个国家的108家出版机构签订了645项资助出版协议,涉及16个文版893种图书,资助金额3000多万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出版浪潮”。我国新闻出版界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新闻出版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了业态的升级转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介绍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2006年整体收入达到200亿元,其中网络广告收入49亿元,互联网期刊创收5亿元,网络游戏达到65亿元,手机彩铃、手机游戏、手机动漫收入高达80亿元,数字出版业正在向纵深发展。



图为新疆和田县维吾尔族果农在晾晒葡萄干。目前,新疆塔里木盆地已初步建成以葡萄、核桃、红枣、香梨、苹果、石榴等为主的特色林果主产区,成为真正拥有特色“大果盘”的“瓜果之乡”。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治理废弃矿山 重现碧水蓝天 鞍山恢复矿山植被15.6平方公里

本报沈阳10月7日电 (记者郑少忠、何勇)深秋时节,记者来到辽宁省鞍山市齐大山铁矿,全然不见矿山常有的荒凉与尘土飞扬,苹果、山楂挂满枝头,仿佛置身农家果园。随行的鞍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介绍,这里是铁矿上的排岩场,原本是裸露的岩石,寸草不生,经过艰难治理,才由沙漠变为绿洲。

齐大山铁矿是鞍山市大力治理矿山、恢复生态的缩影。近年来,作为著名的钢铁城市,鞍山开展了以“向城市沙漠宣战”为重点的矿山生态恢复工程,2008年初,

市委、市政府将加快矿山环境治理列入为全市群众所办的20件实事之一。市政府每年以环保任务书的形式与有关县(市)政府和重点企业签订矿山生态恢复任务,确保年度任务完成。

目前全市已恢复矿山植被15.6平方公里,占同期可治理面积的60%;治理面积大于破坏面积,走上矿山生产与矿区环境保护良性发展的道路。2007年,鞍山每月每平方公里自然降尘量比2002年下降16%,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天数接近300天。

(上接第一版)

陈锡文: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续5年丰收,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6%,又一个农村改革的重要时期到来。如果说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着重解决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和人民温饱问题,为推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则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农村改革30年的两个重要时期,反映出两个时期农村改革的力度很大。

记者:除上述10个中央“一号文件”外,30年来还有许多重要的中央农村文件,其历史作用同样十分重大。请谈谈其中还有哪些重大的支农惠农举措?

段启碧:回顾农村改革30年的历程,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始终非常关注,高度重视,也很熟悉。总是在关键时刻及时采取切实措施,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把农村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些文件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稳定。

具体地讲,1998年以前,重点是抓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减轻农民负担和扶贫工作。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建设商品粮基地和提高粮食价格等措施,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针对当时农民负担重的情况,1996年中央出台13号文件,就减轻农民负担规定了若干个“不准”和“严禁”,有效地遏制了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趋势。其间,中央先后召开了3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加大扶贫力度,基本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8年以后,重点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1999年中央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出台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改革农村税费的政策,从增收和减负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为新世纪最终取消农业税打下坚实基础。

一条“红线”: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

记者:如果将30年来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连在一起看,这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有哪些?

陈锡文:一句话,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0年代至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指出,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他强调,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农业,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断创新。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胡锦涛总书记讲过的三句话很有代表性。第一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二句,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句,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阶段。这些话最终都指向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伟大目标,即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际上,这也正是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的政策指向。我们就是要通过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更多支持,给农业更多反哺,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记者:新世纪以前,中央农村文件各自侧重点是什么?在政策连续性上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

段启碧: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基本取向是“破”,即突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当然“立”也在其中,即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但“破”是主要的,尤其是前3个“一号文件”。首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各种联产承包方式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这给了农民很大选择,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打破。接下来的几个“一号文件”,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针对农村出现的“卖粮难”,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增收缓慢等矛盾,中央又连续出台文件,求解“三农”难题。如提出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并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90年代中后期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等。正是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中央不断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终于在新世纪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两个趋势”的判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战略转变,最终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记者: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跨了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哪些重大突破?

陈锡文:世纪之交,中国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

出的“小康”目标,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但离“全面小康”还有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未打破,“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基于这样的背景,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变化。

2004年“一号文件”出台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下滑,农民增收低速徘徊,中央希望尽快扭转这种形势。当年“一号文件”锁定农民增收,出台了3项前所未有的惠农政策:一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二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三是对重点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这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当年即增产粮食700多亿斤。

梳理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主题分别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丰富系统的内容,凸显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要求,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坚强决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放思想贯穿文件起草过程

记者: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起草过程是怎样的?能给我们透露些背后的故事吗?

段启碧:改革初期,一般都是先分门别类下去调研,还常常委托地方和外单位调研,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起草、汇报、研究政策措施……最终由决策层定下来。

调研中把握两点:一是注意观察农民情绪和普遍性、苗头性问题。二是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这很重要,只有在不断讨论和争论中,才能明辨是非,升华认识。

“一号文件”一般起草需4个月左右,文件写了多少稿也不知道,就是要总结好亿万农民的实践,其中最大的难处是如何冲破传统观念。特别是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农民能否进入流通领域和城市、有雇工的私人企业允许不允许存在……这些争论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当年却是闹了禁区。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时,一些地方借“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之机,不断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1993年,中央及时出台文件,明确提出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政策,对农村发展和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期间,中央及时纠正了一些地方搞“两田制”等侵害农民权益的错误做法,保证了二轮承包工作顺利进行。2002年,国家又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

陈锡文: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同样

建立在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每个“一号文件”形成草案后,要经历科学严谨的讨论、报送周期,我们称之为“过五关斩六将”的程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稿——“一号文件”。说实话,只有每年12月31日文件进了印厂,文件起草组的同志才如释重负。这个征求意见和最终定案的过程,实际就是认识升华、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文件中给农民“真金白银”的表述,必须和许多相关部委协商。中间要多沟通、反复论证,也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

“一号文件”发出大都“震天响”。为什么?就在于看准了基本国情,找准了农民需求,促进了思想解放,有重大历史突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复杂的调查、讨论、研究和决策过程。因为文件一发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就要面对全国人民,必须经得起群众考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农民希望:“我的事我作主”

记者:农民对“一号文件”很有感情,根据您的了解判断,农民现在主要有哪些期盼?

陈锡文: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去河南考察,焦作市的农民讲得很好,从农业生产角度,农民期盼三点:“粮价涨一点,补贴多一点,生产资料价格稳一点”。在起草文件、制定政策过程中,显然要考虑这些问题。

从农民进城务工来看,最大希望是能获得公平公正对待。所以2004年的“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列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强调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要覆盖农民工。

现在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府每年给农民的上千亿元财政补贴,有些被中间截留。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很好保障,农民希望“我的事我作主”。我现在经常会收到农民兄弟的来信,其中反映最多的是承包田被侵占。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是签了合同、受法律保护,不容侵害。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他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段启碧: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广大农民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现在一些地方搞土地流转热情很高,关键要看是不是农民自己想干的。如果是,我举双手赞成。中央文件很早就提出了土地流

国家质检总局——

新生产液态奶未检出三聚氰胺

本报北京10月7日电 (记者左娅)记者7日从国家质检总局了解到:对全国市场液态奶进行的第七次三聚氰胺抽样检测,共抽检了供应22个主要城市和4个中等城市的76个品牌733批次酸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液态奶,均未检出三聚氰胺。

质检总局近期对9月14日以后生产的乳制品连续进行了抽样检测,截至目前,共抽检了2826批次液态奶,均未检出三聚氰胺。各大商场、超市将继续张贴合格企业及产品名单,设置放心乳品柜台,保障市场充足供应优质安全乳品。

河北取缔102个问题奶站

全省鲜奶销量止跌回升

本报石家庄10月7日电 (记者王明浩)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河北采取有效措施清理整顿问题奶站,截至10月6日,全省取缔问题奶站102个,停业整顿33个。据介绍,此次被取缔或停业的奶站多为流动奶站。

清理整顿前,河北共有奶站站点3529个,其中乳品企业自建157个,规模养殖场自建247个,养殖小区建设776个,个体私营投资1431个,流动收奶点856个,其他62个,流动收奶点占到全省奶站总数的1/4左右。河北农业、质检、工商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将所有奶站全部纳入监管,全省累计出动73000余人次检查挤奶大厅及集中挤奶站11400个次、饲料生产企业4439个次、饲料经营单位15058个次。

目前河北鲜奶销量已经出现止跌回升势头。10月6日,全省共产鲜奶8200余吨,乳品企业收购和奶农采取其他渠道转化利用鲜奶两项合计8186吨,占全省产奶量98.7%,奶业生产正在逐步恢复。

青岛边检站法制宣传到一线

违法、违规同比下降二成

本报青岛10月7日电 (张丽)为提高一线执勤人员和服务对象的执法水平和守法自觉性,近年来青岛边检站主动作为,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送法到执勤一线、送法到作业港区、送法到港航企业,“三送法”活动将违法、违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青岛边检站组织有经验的法制骨干深入基层业务科、队,每月开展一次专题辅导,采取互动的形式,现场解答一线官兵提出的疑难问题,提高执勤人员的执法能力。针对青岛港轮驳公司、中燃青岛分公司等单位在编职工人数众多,登轮作业频繁,该站法制宣传小分队与这些公司建立联防机制,定期上门宣讲边检法规和反偷渡知识,为企业培训法制骨干,讲解安全生产常识,受到了各单位的一致好评。

“三送法”活动开展以来,基层科队和服务对象对机关法制部门的满意度评价明显提升,违规登轮、偷渡案件发生总数比往年同期下降了20%。

农村改革要在3个层面突破

记者:有人说,新世纪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已基本形成,农村改革进入一个“平台期”。您认为今后农村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在哪里?

陈锡文:从现状看,农村改革要在3个层面上突破:一是已有惠农政策,今后需配套出台细化措施,不断提高惠农水平。二是有些方面的改革不彻底,需要加速向前推进。三是一些改革尚未启动,需要尽快展开。

总体来看,除了中央已有的部署,农村有4个方面的改革需尽快推进:

第一,村级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要深化改革。目前只改了一半,要继续改下去,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乡镇机构改革应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国务院已明确本届政府要把乡镇机构改革搞完,因为事关农村发展大局。现在我国有62万个行政村,3万多个乡镇,改革的目的是很明确,一是乡镇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二是真正让农民实现基层自治。

第三,尽快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现代农业发展的经济组织。去年我们才实施农民专业合作联社,许多配套政策措施还没有跟进。下一步发展现代农业,“家庭承包制+专业合作社”是符合国情的模式,必须大力培育合作经济组织。现阶段,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简单视为企业是不对的,应在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减免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否则现代农业很难发展起来。

第四,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市场取向改革搞了多年,农村规模经营水平一直较低,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这些年农业部门一直在抓小农服务的社会化服务,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大规模转战南北,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这就是社会化服务。有了这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家庭经营的农业就完全可以走上现代化道路。

从我国实际来看,农民进城意味着3件事必须解决: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

总体来看,今后推进农村改革,“放活”是关键。无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育新型经济组织,还是促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都需要“放活”。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农村改革就深化了,反过来对城市会提出改革新要求,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就会逐步形成。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记者陈芳、宋振远、刘健)